·历史研究·

翻译的“政治”

——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与“输入文明学说”

潘世圣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190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清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艰难运行,成就不彰;革命党之暴力革命已在酝酿之中,而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留日学生创办杂志,致力于“输入文明学说”,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制度变革、制度设计提供理论和方案,此既体现了他们勇于面对社会现实,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激情与抱负,也展现了具有此一时期特色之翻译的“政治”。

[关键词]留日学生运动;输入文明学说;翻译的“政治”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6-0062-07

一

要梳理近代留日运动以及留日学生杂志“输入文明学说”的空前努力,需要系统回顾和整理近代中国历史相应时段的运行轨迹,明确留日学生热忱投身政治思想文化学说翻译的背景和路径,从而理解留日学生杂志所特有的“翻译”政治。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的落败,击碎了大清帝国的天朝之梦,国族挫败的现实,令社会统治阶层和其他一些清醒的有识之士生发了强烈的危机感,“洋务派”及其“洋务运动”(1860-1890)由此兴起,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和张之洞(1837-1909)等实力派人物,开始出现并活跃在“洋务”“变法”的舞台上。“师夷长技”的思路直接连接了富国强兵·自强自立·维护体制的基本目的。由于“中体西用”框架的捆绑和限制,尽管“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了一些维新思想家,如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马建忠(1845-1900)和郑观应(1842-1922)等,这些维新思想家开始注意到西方富强现实背后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功效,他们批判洋务运动取“用”(科学技术)舍“体”(社会制度)的做法。马建忠介绍“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王韬引入“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体制,薛福成对英国议会的两党制赞赏有加,郑观应主张中国实行议会制。但很不幸,这些明智的洞见和主张,在当时还仅仅是非常微弱的萌芽。结果,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国族饱受劫难陷入空前危机,宣告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开启了新一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在这种困境下,以康有为(1858-1927)为首的维新变法派致力变法研究,积极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中国留日学生杂志综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承续《“新知”与“革命”言说的世纪井喷——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潘世圣,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

倡导和推进变法维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纲领。他连续上书光绪皇帝,建议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政,促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实行变法,于是便有了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也是在这一年里,“义和团运动”兴起,到1900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军”出兵镇压义和团,于1901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再一次经受了沉重打击,陷入极其深刻的内外危机中。通过这一场巨大灾难,朝野有识之士痛感改弦更张整顿政治的必要,清朝统治层历经战争失败和朝廷狼狈出逃,也逐渐接受了改革派的主张,准备实行新政。于是,1901年1月29日,清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变法谕旨,宣布实行新政(清末新政):“世有万古不易之长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①并成立督办政务处,负责处理新政事宜,成为领导新政的中枢机关,李鸿章、刘坤一(1830–1902)、张之洞和袁世凯(1859–1916)等成为核心成员。迅即袁世凯上奏,提出意见建言;刘坤一、张之洞更联名上奏变法三折,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尊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江楚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改革方案,规划了清末新政的基本框架,引领了新政的启动和实施。而与留日学生运动以及留日学生杂志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吸收西法”的改革措施,如提出广派王公大臣及宗室弟子出洋游历,考察外国政情,促成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多处提倡学习日本,使得日后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兵制操练新军,学习日本的司法制度,定矿律、路律、商律、刑律等等。1905年以后,立宪呼声日益高涨,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在确立了实行立宪国策的基础上,进入预备立宪时期。由于清廷的宪政改革存在致命缺陷,再加上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兴起,其以革命暴力推翻满清王朝为宗旨,迅速蔓延普及,不仅使得清廷宪政改革成为泡影,更直接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至此,清末新政以清王朝自身的覆灭宣告终结②。

留日学生杂志正是在“清末新政”与“清末革命”的合流与分流中诞生和发展,显现杂志“主人”们的激情与抱负,在各自的短暂时光中为后世留下了一列鲜明的探索足迹。正如由初期留学生编撰的留日指南书《留学生鉴》所说:“吾人不远万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国土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永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强国之第一要义,曰政治之改良也,然非学无以为改良之具。曰社会之整饬也,然非学无以为整饬之具也。曰土地之保存也,然非学无以为保存之具也。曰强邻之平等也,然非学无以为平等之具也。学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且夫有一日之世界,则有一日之竞争,有一日之竞争,则有一日之学问。日日有竞争,日日有学问,事事有竞争,事事有学问。”③至此,与晚清的变革、革命之轨迹完全重叠,1900年代的留日学生杂志也呈现了强而有力的世界的学问——改良变革——推翻体制的革命——爱国救亡的性质,成为启蒙性改革性政治性杂志。与此相适,翻译类杂志也同样作为一种“政治”性存在而展现了其活跃的姿态。

---

①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916页。

②可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周叶中,江国华主编:《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③启智书社著译:《留学生鉴》,东京:启智书社,1906年版。转引自[日本]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修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48–149页。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曾几番查寻转引原著不果,俟今后继续调查发掘。

二

留日学生杂志始于通过专事“翻译”“编译”“输入文明学说”的《译书汇编》(1900),另一本有代表性的则是《游学编译》(1902),另有其他众多综合刊物的译介部分。翻译外国书,“输入文明学说”,是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倡导改革的第一个着眼点。对晚清改革产生很大影响的张之洞《劝学篇》(1898)之《外篇·广译第五》便主张大力翻译外国书:“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①小标题之“广译”,即是广泛翻译外文书籍;主张的要点也很明了:不懂外国文不读外国书,就似耳聋眼瞎,所以要翻译外国书,而最便捷的途径是翻译日本书。这一点,在本质上原本就是覆盖改良变法立宪和革命的基本命题,如果说存在差别,也不过是在翻译、阅读、摄取内容的选择定夺上。留学生杂志的“翻译”及其政治,实质上乃是近代以来变革志向的具体实践。

1900年代初期的中国变革,其焦点是晚清中国深刻危机中的制度变革和制度设计——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其最终指向非常明晰,即如何建设近代国家。再具体说,便是以日本为范本建设同样的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国家②。而对留学生这一群激昂纯粹的知识青年来说,政治、法律、思想精神以及教育文化则是最切近的课题。正像张之洞所提倡的那样,充分利用日本的“西洋翻译”资源,“输入文明学说”,见效快而事半功倍。在这种做法的背景中,其实是有一些非此不可的理由的。杂志的编者和作者们还是一些刚出国门的知识青年,其自身存在许多局限,不论在知识和思想的幅度深度、学术造诣的高度、西语的把握以及对国情与变革的思考上,都处在一个急切接受然后迅速传播的状态。于是先中国数步成功维新的日本成为留学生学习仿效的最佳对象,而近代日本为维新转型所做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恰好为留学生们提供了一大批经过选择筛汰的“新文明学说”的文本资源。鲁迅1902年赴日,是清末留日热潮中的早期留学生,他既是留日运动和留日学生杂志的亲身参与者实践者,也是同时同场的见证人。他在去世之前——时隔留日二十五、六年后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③需要特别留意,这里所说的“新知识”,并不是学校课堂里的课程知识,而是通过(留学生)会馆、书店、各种集会讲演,倾听了解阅读各种有关新的社会、政治、变革、革命的思想和学说。鲁迅早期的“论文”主要发表在《浙江潮》和《河南》这两本杂志上,他也是留日学生杂志的作者和实践者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两本刊物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专事西洋政治及其他学说译介的《译书汇编》和《游学编译》的情况。《译书汇编》的母体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于1900年在东京创办的专门翻译日本著作的译书团体,成员基本是第一个中国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会员,社长为戢翼翚。《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刊登的社告中,列出了该社主要成员,共有14人:戢翼翚(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王植善(上海育材学堂总理)、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周祖培、金邦平、富士英(以上七

①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②关于这一点,旅日学者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二章有非常恳切深入的论述,请读者阅读参考。

③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937年3月25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人均为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章宗祥(帝国大学学生)、汪荣宝(庆应义塾学生)、曹汝霖(中央大学学生)、钱承鎬(帝国大学法科学生)、吴振麟(帝国大学法科学生)。创刊时,编者声称其宗旨为“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主要译载欧、美、日等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著作。这与其前身的励志会之宗旨(“联络感情,策励志节”)和纲领(“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辨辦之基础”)一脉相承。这种“研究实学”“重视责任”的精神始终贯穿于《译书汇编》编译过程之中,更体现在所翻译的以日本书为基本的欧美和日本著述。创刊初期连续翻译登载了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约翰·穆勒《自由原论》、斯宾塞《代议政体》等著作,受到国内外青年和学生的青睐,风行一时。发刊一年多以后,杂志由单一翻译变成著述为主而编译为副,每期附录“欧美日本政治法律经济参考书介绍”,被人们视为“足为研精西学之一助”。杂志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更名为《政法学报》,更名后继续出版十一期即停刊。杂志共出版 21 期,前半专事翻译,后半变为著述 + 编译;所翻译皆为(日本)书,故几乎均为连载形式①。统计下来,其翻译、编译、介绍情况如下:

《政治学》(美国·伯盖司)、《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社会行政法论》(德国·还留司烈)、《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民约论》(法国·卢骚)、《权利竞争论》(法国·伊耶陵)、《政法哲学》(英国·斯宾塞)、《理财学》(德国·李士德)、《物竞论》(日本·加藤弘之)、《现行法制大意》(日本·樋小广业)、《公私权考》(日本·井上毅)、《外交通义》《欧洲财政史》《警察学》《法律学纲领》《欧美各国财政及组织》《支那化成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伦理学》《日本财政之过去及现在》《日本欧美政体通览》《政法通论》《论研究政法为今日之急务》《论国家》《十九世纪外交通规》《法典编纂方法论》《国际法上之印度观》《经济原理》《财政概论》《史学概论》《法兰西革新之机关》《国际法上之日本观》《经济学之范围及分类说》《日本法律参考书概评》《对外观念之适当程度论》《中国货币改革议》《国际法上之蒙洛主义》《生产论》《欧洲历史之人种》《社会主义与进化主义比较》《创造文明之国民论》《日本国会成立之原动力在于日本国民》《俄罗斯之国会》《拔都别传》《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等,总计 30 余部(篇)欧美日本著述,涉及政治、宪法法律、行政、财政、经济、历史、欧美、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等等,体现了刊物同人“研究实学”“重视责任”“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初衷。而后半部分刊物编辑方针的变化,增加著述性的介绍论述也很醒目。

另一本同样重要的月刊《游学译编》于 1902 年 11 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东京创刊,其由湖南留日学生组成的东京游学译编社编辑,熊野萃主编。杨度、周家树、陈润霖、周宏业、曾鲲化、黄兴、张孝准等编译,共出 12 期。杂志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宗旨。开设有“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栏目,刊载文章以编译为主,兼及论著,除介绍域外新知、世界大势外,还鼓吹发展实业,推行近代文明教育。1903 年拒俄事件后,公开宣传反满,主张“下等社会”与“中等社会”结合起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1903 年 11 月停刊。11 期杂志刊载的“编译”如下:《十九世纪学术史》《教育论》《华族女学校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武备教育》《经济政策论》《新定统治蒙古制度》《欧洲近时之外交》《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支那地理概述》《学校行政论》《支那之耶苏教与日本之耶苏教》《致湖南士绅诸公书》《记嘉纳校长演说》《俄罗斯之将来》《日本第一人述》《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政治学说》《英法德美现在教育观》《小

①参见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止庵编:《杨绛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2 – 83 页。文章这样写道:“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学教育之方针》《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今后之支那地理》《东亚冷观》《支那灭亡之风潮》《国民教育论》《英国海军史略谭》《列强在支那之铁道政策》《处置支那政府之方针》《五大强国极东政策》《十四年来之德意志》《南阿独立英雄古鲁家略传》《开发支那社会机关》《论宇宙人类之位置》《军人之教育》《廓尔喀与西藏》《呜呼湖南实业界》《论学校对家庭与社会之关系》《希腊哲学》《二十世纪开幕绝东战争之预测》《埃及亡国惨状记第一》《苏格兰第一爱国者维廉华拉斯传》《达化斋日记》《遍告外清人》《哲学丛谈》《教育泛论》《海权消长始末记》《星亨》《与某君论湖南矿务总局招海外商人承办矿务事》《满洲问题》《东邦之前途及国之生命》《民族主义之教育》《列国海军力之排置》《推广支那内河航路议》《银行铁路为侵略土地之根据论》《支那不可扶植论》《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地相测算沿革谈》《湖南自治论》《二十世纪之军事》《日清银行设立之运动》《十九世纪欧罗巴历史之壮观》《游历官之爱国泪》,以及“附录”《劝滇黔人士游学日本启》和《日本学校系统说》等。

三

作为国家政治改革改良的需要,留日学生杂志最为关注的首属政治、法律、政体、行政这一范畴的书籍及著述,他们试图通过大面积的翻译介绍,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多样的参考和借鉴。这在《游学译编》宣示的“本报十大特色”中有很好的显示,譬如“专主实学,不事空谈,自始至终无一篇简闻章,无一句空泛话”;“ 本报舍所专演政法原理,针对吾国前途,取种种重大问题,全以学理解决,无闪烁两可之语”;“本报采东西各大家学说,融会贯通而著为诸说,大都直接间接有大影响于政法界者”;“本报分学术五门,各由专门家担任吸液弃肤,聚精会神,务取学灯之光普照大千世界,以求学问之独立”;“本报搜集易于触动脑筋之议论事实,而著为警醒录,绘图列说,务使全国国民触目惊心为唤起爱国心”;“本报设访问他山集两门,或述谈片或采投稿,借旁观之清议,指当局之迷津”;“设研究资料一门,专为研究政法学参考之助,或采成法或据新政随时著译”;“本报首页插画,务取有关于政法界学业上者阅之可起爱国之观念”①。而第 7 期的《与同志书》更表现出面对国家危机的急切心情:“今日国势,危险极矣,仁人志士,奔走骇汗,大声疾呼,日谋救亡之法,愤于国力之弱矣,则日讲求武备,痛民生之窘苦也,则日讲事实业。政体不变,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也,则讲求政治、讲求法律。民智不开,民气不伸,而政治、法律卒莫能变也,则日讲求学问,讲求教育。”由晚清留日学生杂志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晚清新政的十年,无论是主张维新变法,还是倡导君主立宪,或者宣扬共和革命,都是对欧美、日本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及其学说译介得最多最杂的时期,其情形与日本明治维新颇有几分相像,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其建立的君主立宪体制,原本一直是晚清朝廷试图学习和效仿的范本,这十年,因应国内或维新变法或改良革命的路向,留日学生杂志的“译书”“编译”也具有了强烈的指向性和丰富多样性。

上面两种翻译(编译)杂志的翻译中,译介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社会教育、哲学流派的最多。除杂志刊载译作之外,《译书汇编》自 1901 年开始出版发行单行本译著,如《国法学》《各国国民公司权考》《国家学原理》 等。后来,译书汇编社由单纯翻译连载逐步转向编译,又更进一步变为以著述为主的形式。《译书汇编》第 7 期刊登了译书汇编社已译待译的 34 种图书目录,有政治法律类 11 种,即《政治进化论》《政党论》《社会平均论》《今世国家论》《平民政治》《政治泛论》《美国民教》《国际法论》《自助论》等;教育类则有 5 种:斯宾塞之《教育论》、卢梭之《教育论》、如安诺之《教育论》,还有《东西洋教育史》和《政教进化论》;历史的 5 种:《理学沿革史》《欧洲文明

①《游学译编》,第 3 期。

史》《明治历史》《近世二英雄传》《经济学史》;另有社会学 4 种、军事 3 种、新闻与外交、经济等 6 种。当时留日学生杂志间经常相互刊登彼此的杂志出版信息,1903 年《浙江潮》第 1 期便刊出了译书汇编社的书籍出版广告 31 种,其中政治类 15 种、哲学 2 种、经济和历史 8 种、小说和传记等 6 种。

另有以往留日学生杂志研究中尚未有人涉及的具体问题。这一时期的杂志所刊载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时期”性特征。即翻译→编译→译介这样一种游动混合的状态。比如翻译作品并不标示原著的具体信息,像《十九世纪学术史》(《游学编译》第 1 号)、《日本财政考》(《浙江潮》第 1 号)、《政体进化论》(《江苏》第 1 号)等,从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来看,能够推定其原著为日本书,但文章作者、译者或编译者却很少明确交代原著和原作者的信息,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判明一系列翻译的原作文本的情况。

另外,本文首次对各杂志刊载的“单行本出版广告”进行了统计整理和考察,在 1900 年代的发现广告提及的单行本中,有不少并未标示原作者、翻(编)译者及出版社等基本信息。杂志中,目前可以见到的二十几种杂志刊载的单行本广告中,去掉部分重复者,一共有 564 种单行本书籍。这些书籍自然都是中文书籍,但经过我们的整理和判别,这 564 种单行本的具体形态如下:1. 原著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有 271 种,几乎占全部单行本的一半。2. 原著为西洋人所作的 42 种(其中 7 种属确定无疑,另外 34 种推定为西洋著作,但除《第一世拿破仑言行录》1 种以外,其余皆由日语本重译),而翻译编辑均为留日学生所为。3. 中国人著述 12 种,如《新大陆游记》《明儒学案》等。4. 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译本的编译 2 种。5. 著者不明著述 237 种。其中教科书 61 种,中国人著述 12 种,日本书翻译 32 种,以及不详者 137 种。教科书类基本译自日本书,理由是当时恰逢日本教科书翻译的热潮,译书汇编社的成员陆世芬专门成立了“教科书译辑社”,专门编译日本教科书输往中国国内。总之,在总计 564 种书籍中,译自日本(包括重译)或受到日本影响的在七成以上。在编译出版总量上,以教育类书籍最多,依次为教授法(如《小学教授法》《教授法各论》)、学校教育管理(如《学校实践管理法》)、教育学(《实用教育学》)、教育史(《东西洋教育史》)、教育制度(《美国教育制度》)等。除教育之外,法律方面的书籍很多。当时日本重要的法律书籍,如梅谦次郎《民法总则》、冈田朝太郎《刑法总论》、高天早苗《宪法要义》等竞相翻译出版。第三类为教科书,尤其是小学中学教科书。第四类则是政治(学)类书籍,如《政治进化论》《政治哲学》《政治泛论》等,其原著出自西洋。第五类则是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书籍,如《支那现情》《支那文学史》《支那史要》《最近支那论》《支那化成论》《支那哲学史》《支那及列国》《支那教育问题》等等。

四

1900 年代的留日学生杂志及其背后的留日学生运动的两翼(或曰两个车轮)便是以翻译(编译)为代表的“输入文明学说”,这个时代的翻译首先并不是“翻译”,而是一种鲜明特色的“政治”。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社会渐次兴起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乃至革命的强烈诉求,其找寻到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向世界学习,而留日学生运动本身及其“杂志”“翻译”行为,恰是这一历史性实践的最早一部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规定了留日学生杂志及其翻译行为的若干特征。

第一,留日学生杂志与清末中国社会变革政治变革运动的一体性。与其他时代的学生同人杂志不同,这个时段的留学生杂志几乎完全没有一般学生同人刊物常见的娱乐性、文艺性、日常生活性,也看不到轻松的愉悦的审美的情致。在爱国图存的生死危机和维新变革的朝野集体诉求面前,杂志的编者和作者们自动自觉地投入到了保国保种、变革新生的奋斗中。正如《教育》杂志意欲“开民智”而“救国”,“融合东西”学说,“洗垢穷理”,“扬新阐旧”,进而实现“匡正人心”,拯救“公理沦亡”。在这里,杂志“编译”活动目的的高度明晰与爱国图存、改良改革建设近代国家的高度紧

迫感融为一体,凝结为广泛翻译介绍西洋文明学说,期望在浩浩思想和言说的资源中,发现国族更生的有效武器。

第二,翻(编)译的普遍性与庞杂性。正如前面列举的编译杂志刊载目录以及单行本出版预告目录所展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翻译极其庞杂,几乎囊括了以欧美为中心、包括日本在内的政治、法律、行政、经济、教育、历史等社会科学的所有主要领域的学说著述。由于翻译介绍的基本前提是以成功实现近代转型的日本为借镜,建构近代国家的基本模式,因此翻译介绍也自然遵循和借用日本的知识和思想体系资源,体现在出版的译书至少有七成以上来自于日本(文)书。这种局面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毕竟无论是编辑者还是作者(其实大部分时候这两种身份是集于一体的),还都是年轻的学生,无论是学识体验还是思考和实践,他们还都没有充分的能力和条件去建构"思想",去实践"政治"。仿佛一块海绵在水里,只能通体吸收,在接受和传递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思路。而实际上,由于杂志存在的时间都很短,编译者作者的流动和变化很大很频繁,各个杂志及其主持主体几乎都没能实现"发展""飞跃"和"体系化"。他们用青年的热情、对国族的关切,用追求变革的激越,拼力"搬运""文明学说",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为稍后不期而至的"革命"进行了多样的准备。

第三,在狭义的"翻译"编译"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杂志的编译活动形成了近代"翻(编)译"史上的一段特殊现实。即,翻译的"政治",留日学生们迫不得已地选择了一种可能的变革方式"翻译",介入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尽管"革命"的到来改变了"维新变法""改良改革""君主立宪"的"新政"设计,但这一段颇具规模的"翻译"的政治实践,仍然具有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而留存于历史记忆中。在作为学术和文化行为的"翻译"这一意义上,这个时期的"翻译"确乎很不"规范":无论书还是文章,几乎都没有原作信息的标示,翻译、编译、介绍的界限极其模糊,以至于时间久了,作者自身都不知道自己的文章(翻译)来自哪里,这是鲁迅在回忆自己留日时翻译日文书籍的一段话①。也就是说,留日学生杂志的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学术文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论活动,此即所谓翻译的"政治"。

[责任编辑:周　南　jidazhounan@163.com]

①鲁迅说当时的翻译"悉勾稽群籍为之","而当纂辑,又在课余,误谬知不可免。"(鲁迅:《〈中国矿产志〉例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卷壹,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又说:"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就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